清华简《厚父》与《孟子》引《书》

李学勤

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，是在2008年7月入藏的。经过必要的清理和保护之后，2009年春天，我们利用新拍摄的竹简数码照片，对业已散乱的这批珍贵材料进行了一轮通读，目的是了解一下大致有哪些重要内容。记得当时看到一支简，上面赫然有“作之君，作之师”等字样，使大家甚觉兴奋，因为有关文句曾见于《孟子》，而且是明确出于《尚书》的，我们迅即记录下来。这支简，是最近整理注释的《厚父》一篇的第五简，该篇现已收进整理报告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第五辑[[1]](#endnote-1)。

《厚父》全篇由十三支简组成，简背记有序号，从而没有编排方面的疑难。可惜的是第一支简上下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，其余各支都保存完好。最末一简背原有篇题。《厚父》这一篇名前所未闻，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。

经过释读知道，《厚父》体裁为“王”同一位叫“厚父”的人之间的对话。有关的一段文句，尽可能用今字写出，是这样的：

厚父拜手稽首，曰：“都鲁，天子！古天降下民，设万邦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曰其（助）上帝下民。……”

除开头的“厚”字在第四简末外，这些话都在第五简上。

文句中有几处须略作解释。“都鲁”是感叹词，也见于清华简尚待整理的另一篇，应即《尚书·尧典》等篇中的“都”。“”读为“助”，已见于清华简第一辑的《祭公》等篇。“”《说文》训为“治”，云“读若乱”，是人们熟悉的。

可与简文对勘的《孟子》文句，见其《梁惠王下》章。章中孟子针对齐宣王自称“好勇”，征引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讲了一段话。为讨论方便，将涉及引文的几句抄录如下：

《诗》云：“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笃周祜，以对于天下”，此文王之勇也，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《书》曰：“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曰其助上帝宠之。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”一人衡行于天下，武王耻之，此武王之勇也，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

孟子这里引述的《诗》，是《大雅·皇矣》，和传世《毛传》本只有个别异文，其为歌颂文王功绩，人所共知。至于《书》，赵岐注只说是“《尚书》逸篇也”，未能举出具体篇名，足见当时已经没有该篇在世间流传。

由此引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孟子述及的《书》，文句应到哪里为止。赵注解释说：“言天生下民，为作君，为作师，以助天光宠之也。四方善恶皆作已，所谓在予一人，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？”表明引《书》文句是到“有越厥志”。但有学者不同意这一点，如王鸣盛《尚书后案》便主张直至“武王耻之”“皆《书》词，皆史臣所作”。这是由于《孟子》上文于引《诗》后直接说“此文王之勇也”，从而认为“此武王之勇也”前面都是引《书》。这个看法是不对的，如臧琳《经义杂记》所说，“一人衡（横）行于天下”云云，应为孟子对《书》文“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”等语的引申[[2]](#endnote-2)。说“武王耻之”，更不合于《尚书》习见的体例。

东汉时赵岐不知道孟子此处引《书》的出处，到了东晋时流行的《孔传》本《尚书》，却把有关文句编进《泰誓》三篇中的《泰誓上》：

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其克相上帝，宠绥四方，有罪无罪，予曷敢有越厥志？

不难看出，这是对《孟子》所载引文做了一些煞费苦心的改动，使之比较容易理解。例如《孟子》所引云作之君师“惟曰其助上帝宠之”，是说协助上帝“宠”下民。赵注释“宠”为“光宠”，但上帝何以要“光宠”下民？君师又怎样协助这种“光宠”，殊不可解。《孔传本》《泰誓上》在“宠”下加一训安的“绥”字，又改变句读，以“四方”作为宾语，就显得通顺一些。

其实，孟子引述的这段《书》文，从经学史的角度看，是不可能属于《泰誓》的。江声《尚书集注音疏》已指出，《泰誓》在汉代“列于学官，博士所课，不目之为逸《书》也”。[[3]](#endnote-3)还应当注意到，《孟子》书中还有两处征引《泰誓》，一处在《滕文公下》，引“我武维扬”等语，冠以“《太誓》曰”；另一处在《万章上》，引“天视自我民视”等语，冠以“《泰誓》曰”，两处赵注都不认为是“逸《书》”，所以赵注明称“逸《书》”的，不会是《泰誓》。

现在让我们再看清华简《厚父》的有关文句，就会看出这可能即是孟子引文的出处。

首先，简文“古天降下民”，用“降”字与《孟子》同。该篇前面追述夏禹治水，也有“……川，乃降之民，建夏邦”的文句，与这里“古天降下民，设万邦”相呼应。

“设万邦”句，不见于《孟子》，当系传本有别。按“万邦”一词屡见于《尚书·尧典》、《益稷》、《洛诰》等篇。

简文的“”，《孟子》所引作“助”，彼此吻合。要知道，“”字为“助”，乃是近年学者反复研索得到的认识。

《孟子》引文最费解的“宠”字，简文作“”，前面已说明当训作治。君师助上帝治理下民，语意十分顺适。看来《孟子》的“宠”只是一个讹误。

至于《孟子》所载“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”两句，不见于《厚父》简文，这应该也是传本的不同。类似的情形，我们在清华简第一辑所收《尹诰》篇里已经遇见过了。按《礼记·缁衣》篇中引《尹诰》云：“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，自周有终，相亦惟终。”简文只有“尹念天之败西邑夏”一句，解决了《缁衣》引文首句的问题，“自周有终”等句则未见于简，其涵义也全不明白。此处“四方有罪无罪”云云，很可能也是一样。古书历久流传，有种种异文，是常有的事。

如果像上面所说，孟子所引确系来自《厚父》的一种传本的话，我们便可以得出几点推论：

第一，《厚父》是战国时通行的《书》中的一篇，我们在清华简中读到的是该篇在楚地的传本。

第二，《厚父》中的“王”乃是周武王，所以尽管篇中多论夏朝的兴王，该篇应是《周书》，不是《商书》[[4]](#endnote-4)。

第三，《厚父》篇尾“民式克敬德，毋湛于酒”一段，与《尚书·酒诰》和大盂鼎铭文关于酒禁的论旨相同，均为针对商朝的覆灭而言。

《厚父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献，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究，以上所论是否妥当，尚祈大家指教。

（《深圳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3期）

1.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第五辑，中西书局，2015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参看焦循：《孟子正义》（《诸子集成》第1册），第69页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同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在《厚父》简整理过程中，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马楠博士、程浩硕士等都指出了这一点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